

中國現代化與基督教中國化 視域下的婦女解放運動

——以中華婦女節制會創立者劉王立明為例

■ 王 凡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

引言

婦女解放運動、婦女主體性話語的重建，是近代中國追求現代性的重要一環。世界女權主義的浪潮最先從西方興起，在鴉片戰爭後，隨著基督教尤其是女傳教士的入華，給以儒家傳統綱常倫理為基礎的中國社會造成了第一次衝擊。隨後，由於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國內先進知識分子也開始接觸到西方女權主義思想，在保種救國的目標下展開了以婦女放足、婦女教育、婚姻自由等方式為主體的婦女解放運動。但是，由於時局的混亂和缺乏組織、領導，婦女解放始終無法成為主要社會議題。在以馬克思主義為領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之後，真正開始改變了中國女權主義和婦

女解放運動的話語場，把「男女平等」與「婦女解放」推到革命話語的前沿位置。在這個過程中，教

會與基督教女性知識分子在思想和指導上作為推動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而以往的研究則常常忽略這部分力量，從而割裂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連續性。本文希望通過以中華婦女節制會創立者和領導人、民盟中央委員劉王立明女士的個案為例，以劉王立明女士的經歷與著述為線索，聯繫基督教信仰與婦女解放運動，在基督教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雙重視域下探析中國婦女解放進程，為基督教中國化任務提供新視角，也填補對於劉王立明女士研究中的空缺^[1]。

一、基督教傳入對婦女解放的貢獻

清末民初，自從第一位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進入中國大陸以來，其傳教活動受到了諸多阻礙。首先就是中國政治制度、文化傳統與西方基督

教思想之間的衝突。當時的中國百姓目不識丁，對科學、技術、醫療、衛生等知識不甚了解，甚至在

摘 要：世界女權主義的浪潮最先從西方興起，在鴉片戰爭後，隨著基督教尤其是女傳教士的入華，給以儒家傳統綱常倫理為基礎的中國社會造成了衝擊。本文將在基督教傳教士引導下的婦女解放分為在男性傳教士的倡導下的女性覺醒、在女性傳教士的倡導下的女性覺醒、中國女精英倡導下的自我覺醒三個時期，體現出了基督教對中國婦女解放的積極貢獻。並通過以中華婦女節制會創立者和領導人、民盟中央委員劉王立明女士的個案為例，以劉王立明女士的經歷與著述為線索，聯繫基督教信仰與婦女解放運動，在基督教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雙重視域下探析中國婦女解放進程。本文認為，劉王立明是近代兼長理論與實務經驗，將基督教社會慈善、社會服務的精神和實踐方法與中國本土需要相結合的婦女運動人才，但她的婦女解放思想也有其時代與階級局限性。

關鍵詞：劉王立明；基督教；婦女解放

官方的宣傳下將西來的基督教視作洪水猛獸。為了改變這種現狀，馬禮遜等傳教士創辦學校對人們進行教育。在此之後，傳教士們發現，他們所遇到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在傳統觀念下被受壓迫的女性之入教問題。女性在封建禮教的桎梏下很難有機會出門會見男性傳教士，在身體缺陷上又因纏足而無法前往教會。為了更好地在中國婦女內部進行福音的傳播，傳教士們將抨擊和改良傳統女性陋俗文化作為重要手段，著眼於反對纏足、開辦報刊、創設女校等。可以說傳教士在中國是「振興女學，釋放女人，與提拔女人平等之地位，造就女人同具之才能」（林樂知語）的最早倡導者和最先實踐者。^[2]而根據婦女群體的發展和傳教士身份的轉變，本文通過以下三個視角進行分析：

1. 作為「他者」在男性傳教士的倡導下的女性覺醒

最初來到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多為男性，由於傳統觀念對女性的種種限制，傳教士很難接觸到中國婦女向其傳播福音。江西耶穌會在給郭弼恩神父的信中曾提到：「中國婦女從不走出家門，也不接待男士們的訪問……以至於她們最關心的是將腳纏小，自己剝奪自己行走的權利。」^[3]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婦女首先不能走出家門，其次因為纏足又無法長時間行走。為了改變這一現狀，在思

想上各教會傳教士通過創辦報刊對傳統禮教進行抨擊，認為陋習文化與基督教教義不符，主張反纏足運動，給予女性行動上的自由。在實踐上，對於女童，教會學校通過免除學費、發放獎學金或提供免費早午飯、住宿的方式吸引窮困家庭能夠送

家中女童起前來上學。對於成年女性，則招聘她們來教會做工，為中國婦女提供一個經濟自主的管道。^[4]在反纏足運動中，1874年在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嘉溫(Macgowan)倡議下成立了廈門戒纏足會，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反纏足組織。^[5]雖然近代知識分子如梁啟超與汪康年等人也曾組織天足運動，但不可否認的是，解放女子纏足這一陋習，應屬基督教傳教士最早發起。

傳教士對於中國婦女施以教育的目的主要在於：第一，培養女性福音工作者；第二，樹立談吐高雅的女性基督徒形象作為福音影響的範例。^[6]也就是說，傳教士們興辦女學、嚴禁纏足等還是以能夠更好地傳播福音為核心目的。但是，這一時期傳教士宣揚女性解放、衝擊中國封建倫理思想、對女性進行教育，都有助於中國婦女在思想上的覺醒和社會地位的提昇，為後來基督教女知識分子的出現奠定了基礎。而男性的傳教士們作為女性群體中的「他者」，還無法真正深入的女性自身的改變意志，難以調動起女性自主進行解放的能動性。



2. 作為「他者」在女性傳教士的倡導下的 女性覺醒

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中英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來自西方的外國傳教士也因此享受到了特權，從而迅速擴大了在中國的活動範圍與活動領域。這一時期有許多女傳教士來華。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英國「東方促進女子教育協會」女傳教士愛爾德賽（Aldersay）在五口通商城市之一的寧波創辦了第一所在華教會女校——寧波女塾。當女傳教士們與中國女信徒接觸時就會發現，她們所要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如何在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傳統習俗穩定性之間的調和。¹⁷尹翼婷通過對英國聖公會女部傳教士的研究認為即使西方最先引發了女權運動的思潮，強調女性步入社會，提升了女性社會地位。在新的家庭觀念下所孕育的基督教家庭，相較於非基督教家庭較文明、開放，重視女孩、重視教育、支持女子外出工作，家庭關係中封建色彩較少，但依舊強調女性的家庭責任，不能脫離傳統為人妻、人母的家庭角色。這是因為，雖然基督教教義中一方面強調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另一方面也擁有其保守的一面，即認為女人出自男人的肋骨、女人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協助男人作工等，都要求女子服從、支持丈夫，其生活的重心依舊在家庭之中。也就是說，即使女權運動最先在歐洲興起，但女性依舊沒能從家庭中脫離出來，這就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具有相似之處。然而即便如此，接受基督教出世思想的女傳教士和接受中國儒家入世思想的中國婦女之間，依然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鴻溝。女傳教士們帶給中國婦女也只是一種「基督教式的家庭主婦角色」。¹⁸女傳教士在解決中國婦女信仰與傳統、家庭與事業問題時，只採用簡單的西方式「基督化」、「福音化」的植入。

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國精英女基督徒們被激發起濃烈的愛國熱情，紛紛參與到救亡運動之中。在西方女傳教士看來，這些做法也與基督教的教義有悖。因此，在中國婦女意識覺醒的背景中充滿了各種政治環境、文化環境等影響因素，而作為中國婦女的「他者」，女傳教士雖然能夠在信仰和傳統中進行有效的調和，也能夠作為同一

性別群體與中國婦女進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但由於她們無法理解中國婦女的民族情感，甚至無法以平等的目光來看待中國婦女，只將她們看作急需得到拯救的群體。此時基督教依舊與中國社會具有難以調和的矛盾。

3. 作為「主體」在中國女精英倡導下的 自我覺醒

20世紀初，第一批中國基督教女性精英從西方的學成歸來，她們接受過良好的現代科學教育，並通過出國留學拓寬了自己的視野。著名的基督教女性知識分子有金雅梅、吳貽芳、石美玉、曾寶蓀、劉王立明等人。中國基督教女性精英是將中華文化傳統與基督教思想完全內化於一身的新女性的代表。正是這些精英女性的出現，女性爭取獨立和自由成為了中國新世紀的主題。這是中國婦女真正作為中國婦女解放的「主體」所進行的以自身為驅動力而推進的自我覺醒。

20世紀在美國還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節制運動。節制運動是由「基督教婦女節制會」（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簡稱為WCTU）所推動的絕對禁酒禁毒，反對非道德行為、主張婦女保護、家庭保護和兒童關懷的行動。此項運動甚至影響了美國憲法的改動。對於節制運動，國外學者有充分的研究，如Jack S. Blocker所著的《美國節制運動：改革的循環》（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s: Cycles of Reform），Ruth Bordin的《婦女與節制，對權力和自由的探求》（Women and Temperance, the Quest for Power and Liberty）等等。

在美留學生們受到了世界節制運動的影響，聯想到鴉片戰爭後國人倍受毒品的侵擾，於是決定建立中國基督教婦女節制會。其中任中國基督教婦女節制會主席的劉王立明女士，不僅從小就在教會學校學習，在青少年時期還作為世界婦女節制會的發展會員出國留學。學成後，她一直專注中國婦女事業，直至抗日戰爭後與丈夫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民盟中央委員之一。劉王立明女士一生的經歷中，不僅在基督教背景下進行學習成長，甚至衝破了「基督教式的家庭主婦角色」的局限，真正進入社會並參政議政。可以說，在中國的婦女解

放運動中，劉王立明女士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

二、劉王立明的婦女解放思想與實踐

劉王立明(1896年1月1日-1970年4月15日)，女，本姓王，安徽太湖縣花園楊銘屋(今新倉鎮鳴山村)人，字夢梅，小名楊順，曾用名鄭志潔，因紀念丈夫劉湛恩^[9]遭日偽特務暗殺，改姓劉王。中國著名的婦女活動家，1920年畢業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西北大學生物系，回國後任中華婦女節制會青年部幹事、會長。第一至三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曾發起組織中國婦女聯誼會。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 婦女解放思想的產生

劉王立明的前半生，特別是在她的早期成長階段，已經與基督教有著密切的關係。當劉王踏入學齡兒童時，其家鄉太湖沒有一所女校，因此她只能看著自己的兄弟去上學。其父對女兒疼愛，所以在劉王12歲時，在家接受王父的庭訓。那時她所學的是「凡為女子，先學立身，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之類三綱五常等封建婦女的禮教。但是，王父本人的思想卻並不封建，且與秋瑾^[10]、徐錫麟等人是好友。^[11]在思想上，王父的開明在劉王人格成長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行動上，王父曾在夜中幫助劉王放足，給予了她擺脫封建禮教的支持。然而不到半年，隨著父親的去世，劉的學業也因此中斷。在《我的學生時代》一文中劉王提到，她的母親卻非常傳統，堅持要她纏足，認為這是女人終生幸福的基礎。1909年，劉王13歲，美國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衛理會)在太湖福音堂開設成美女學，她也因此機會被母親送入學校，並以大考第一的成績免費升學到美以美會開辦的諾立書院。^[12]

劉王在讀期間，一位世界婦女節制會代表到學校進行演說，在其祛除陋習、拒煙禁酒、婦女責任等宣講的感召下，她決定加入婦女節制會，參與組建九江諾立婦女節制協會並當選會長。1916年，剛畢業的劉王被世界婦女節制會選派去美國芝加

哥西北大學留學，就讀於生物系。但在此之前，她需要處理的一件大事就是解除兒時定下的婚約。在當時，如果女性拒絕親事，則有可能直接被搶婚，而這也發生在了劉王身邊的女同學身上，導致劉王最初對留學一事的猶豫，也從此立下追求婦女解放的志願。可見，無論是女子教育的缺失、纏足還是包辦婚姻帶來的危害，都集中體現在了處於那個時代的劉王立明身上。而這些早年的遭遇，使她感受到中國婦女命運之可憐，對她今後展開節制工作和婦女運動奠定了基礎。

留美期間，劉王與美國學生親密交往，她廣泛接觸和了解西方社會，特別關注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並注意比較不同文化背景下婦女觀的差異。^[13]並且打破了中國女留學生從不出頭的傳統，加入留美中國學生同盟會，積極參加演講比賽，在此過程中其優秀的演講才能有了極大展現。不僅如此，即使身處異國他鄉，她也時刻關注國內政治動向。1918年，在芝加哥時，她遇到了世界婦女節制會會長維麗德(Frances Willard)，更加堅定了她今後參與中國婦女節制運動的決心。1920年，美國酒商因國內禁酒而企圖向中國市場投資興辦酒業，劉王為此在美組織了拒酒會，抗議美國酒商來華。

2. 婦女節制思想與實踐

學成歸國後，劉王立明在中國婦女節制協會任職，致力於改善家庭生活、消除社會陋習和救乞運動。婦女節制會最初興起於美國。1874年，美國社會酗酒成風，對家庭、社會和國家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很多婦女都因此遭受了極大的痛苦，於是有意志的基督教女性們團結起來，創建了美國基督教婦女節制會(WCTU)，其主要目標就是推動禁煙禁酒、節制運動。最終，這一運動最終影響了美國禁酒法案(又稱「伏爾斯泰得法案」)的確立。1883年，時任美國基督教婦女節制會會長的韋凡理女士看到在美華僑沉溺於鴉片，頗感痛心，她曾對其友人說：「此煙酒魔魘，非獨吾美國當克服之，即全世界亦當鏟除之」，於是在次年發起了世界基督教婦女節制會。^[14]隨著女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節制運動也隨其而來。1884年，美國基督教會派諾冰心等在鎮江寶蓋山創立崇實女校，並首創中國婦女



節制會。「先由校中女生及附近婦女做起，如戒酒、拒毒、放足、禁賭等」「此校既經成立，梁啟超先生竭力提倡女學，於是十數年中，我國公私立及教會所辦之女子學校，如雨後春筍……」。^[15]1920年秋，劉王立明從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歸來，謝絕了他處的邀請，毅然決然地加入到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會的建立中去，並於1922年正式在上海成立。其中，著名女醫師、佈道家石美玉^[16]女士任會長，劉王立明任總幹事。

由於中國面臨的問題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為了適應中國的實情，使婦女節制運動進一步本土化，節制會重新調整和確定了具體的目標和內容。首先，節制會將吸食鴉片、飲酒和吸煙列為破壞中國社會道德和健康的主要惡習，成立中華民國拒毒會，號召全國女界一致拒毒。其次，針對中國傳統糟粕下形成的包辦婚姻、蓄婢納妾、強制纏足等進行抵制，主張自由戀愛，建立一夫一妻制；對因鴉片、戰爭等家破人亡的乞丐和老弱婦孺，建設救濟院、教養院進行救濟；幫助失足婦女改造，建設職業教育學校幫助其自立。節制協會早期主要宗旨即：「規勸國民共知煙酒之害而遠離之，他如拒絕賭博、彩票、妓女等害、補救貧窮、提倡教育、改良家庭」。^[17]由於國內環境並不允許進行大規模公開的遊行、抗議活動，所以，中國婦女節制會也根據其限制進行調整，通過在學校、教會公開宣講，舉辦遊藝活動、創辦報刊^[18]等活動來進行節制運動的宣傳和推廣。

3. 婦女參政思想與實踐

劉王立明婦女運動的另一特點是主張婦女參政。隨著西學的興起，西方的天賦人權說逐漸為中國學界所知，其中提到人生來就享有平等的權利。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辛亥革命後的約法「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也都強調女子既屬國民全體之一，也是人類的半數，故有參政之權。並且，由於女學的提倡和興起，女性知識分子開始覺醒到在觀念、習俗、法律、政治上的男女不平等，紛紛發起提倡平等平權的女權運動。李大釗將這一時期的女權運動總結為「社會上種種解放的運動，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運動，是打破父權（家長）專制的運動，是打破夫權（家長）專制的運

動，是打破男子專制社會的運動，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義、順夫主義、賤女主義的運動」。^[19]

1922年10月，劉王立明等上海女界在勤業女子師範學校歡迎北京女子參政會代表萬璞女士，開始準備上海女子參政會的籌辦，並舉行籌辦會議。會議指出：「女子參政為女界謀幸福之唯一要素」「女子參政，並非為爭權，是爭人格而起」。^[20]10月15日正式成立女子參政會上海支部。1924年，國共合作後，劉王立明與劉清揚、向警予等早期女性共產黨人及滬上各婦女團體組織促成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為婦女參政之先鋒，倡議恢復女子作為國民一員而參政的天權，另訂男女平權及特別助進女權發展之憲法與法律。^[21]劉王立明十分認同王世傑^[22]的女子參政思想，認為女子參政對於女子思想的解放、生活的和睦、職業的多樣、人格保障都有積極的影響，對於兒童保護，惡德的糾正、政治的純粹、世界的和平都有絕大的貢獻。

值得指出的是，激進女權主義者完全否定傳統對女性責任的定義，提倡女性完全脫離家庭，拒絕使用「賢妻良母」等形容女性。而劉王立明相對來說則主張女子履行家庭責任，重視女子的家庭內部工作。專門撰寫《母性應擺脫麼》一文回應金石音女士提出的母性擺脫論。劉王立明這一思想與她作為基督徒深受基督教性別觀影響有關。將在下文進行詳細論述。

4. 婦女抗戰思想與實踐

抗日戰爭時期對於中國基督教界來說是一個特殊時期。在教義與處境、奉主與愛國、信仰與民族身份之間進行了艱難抉擇。聖經中強調「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路6:35），教會即國外傳教士則主張遠離政治，應更加專注於福音事工。一些基督徒認為信仰在愛國之上，如有一位基督徒曾說：「有時如果因為愛國問題而發生阻礙基督道理的，則我寧願捨愛國之美名，而斷不肯阻礙福音的流行啊。」^[23]而另一些基督徒則將信仰與愛國深刻地聯繫在一起，強調作為國民一份子的基督徒有責任參與抗戰救亡運動。如基督徒萬福林發表文章說到：「今日中國國難已至最嚴重關頭，我們全國人民，應急起背負十字架來共赴國難，否則

就不配做中國國民，正如不背起十字架，就不配做基督的門徒一樣！」^[24]

劉王立明認為作為國民的一員，愛國即是天職。一些基督教婦女也認同愛國精神的個人信仰的統一，也重視婦女工作，但她們的事工依舊局限於教會思想。如《真光雜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到：「我們婦女的責任是何等重大啊！我們當求主幫助我們盡心作以上所提的四件事，就是治家、教養孩童、為國家禱告、為主傳道。這樣我們不但是為國家服務，且能在主面前蒙喜悅了。」^[25]但劉王立明的事工並不僅限於口號和思想，而是真正參與到救亡運動中去。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劉王立明得知此事十分憤慨，決心投身於抗戰工作。她積極與上海女界促成婦女救國大同盟，決心團結全國婦女，推進婦女救國運動。其主要方式是提倡自主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支持國貨。不僅如此，還組織中國航空協會女子隊，募捐購置女子號飛機來支持抗日。

1935年，共產黨領導北平大中學生舉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史稱一二·九運動。「劉湛恩、劉王立明聯絡上海基督教界著名人士顏福慶、李登輝、沈休蘭、吳耀宗、劉良模等28人，共同發表了上海基督徒對華北事件宣言，強力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妥協，『不特沒有滿足侵略者無厭之求，並且快要把我們的民族淪於萬劫不復的地位』；呼籲全國民眾起來，對於分裂領土的企圖，對於一切威脅與壓迫，『堅決地作勇敢的反抗』。宣言嚴正申明，『我們愛和平，但我們更愛公道；我們不願做無謂的犧牲，但我們也不惜為真理而流血』，表示要『盡我們的力量，去作這個偉大的反抗運動的後盾』。這是一份代表上海愛國基督教人士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戰書。」^[26]這明確表達了中國基督教界抗戰救國的決心，在國難當前的危急時刻，完成了基督教與愛國主義的融合，為推動基督教中國化突破一大難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劉王立明又率領中華婦女節制協會人員參加何香凝領導的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和中國婦女慰勞會，為戰場前線捐贈戰略物資和通信器材，並設立獻金日，鼓勵各界女性

為抗戰捐獻。1938年，劉湛恩因堅決抗日，拒絕出任南京偽政府教育部部長而遭到日偽刺殺。劉王立明知此噩耗，悲痛不已。但她依舊堅持為抗日救國和婦女解放而奔走，輾轉武漢、重慶、香港等地，繼續從事愛國活動。劉王立明曾在國民政府組織的國民參政會，六年期間提出許多有意義的提案。但由於其女性身份和提倡結締同盟（外交）、民主自由（制度）、國共合作（黨政）等，受到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參政員的質疑與反駁。也由於其對共產黨的認同，使其無緣於第四屆參政會議。此後，劉王立明加入中國民盟繼續其政治事業。

三、劉王立明的家庭倫理思想

1. 家庭觀

正如上文所述，女權運動最早興起於西方，隨著西學傳入和女學興起而在中國引起反響。向警予將當時中國流行的女權運動主要分為三派：勞動婦女運動、基督教婦女運動和女權及參政運動。其中女權及參政運動這一派的主要推動者即女知識分子。而女知識分子的組成又區別為基督教背景女知識分子的和非基督教背景女知識分子。向警予又將她們分為三種類型，即小家庭派、職業派和浪漫派。^[27]劉王立明一方面受到基督教性別觀的影響，從職能分擔方面認為女性應擔任起改良家庭的責任。另一方面，在留學期間，劉王立明充分考察美國家庭的特點，她認為建立西方式小家庭體制是幫助女性脫離宗族父權桎梏的主要方式。雖然劉王立明同時重視女性的職業和參政問題，具有較為混合的實踐方法，但相對於職業派所主張的完全脫離家庭，甚至主張消滅家庭，劉王立明更加保守，認為女性應更重視其在家庭內部的影響力。因此，她的主要思想更傾向於小家庭派。

劉王立明認為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礎，主張家庭是社會的基石，她說：「家庭對於人類的任務，除保存種族的生存而外，還須謀民族的解放和社會的革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家庭為社會服務』」。她認為，家庭的改良能夠間接引導社會的改良，而婦女盡好家庭職責意義重大，尤其是已婚

婦女首先應該承擔起家庭的責任，盡力做好母職，之後再要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職責。因此，圍繞家庭主題，劉王立明分別從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和作用、如何建立家庭、如何治理家庭等展開了充分的論述。

劉王立明認為「本著分工合作的原則，男的盡忠職業、為國犧牲、女的撫育子女、管理家事」，主張已婚女性的天職是管理家庭。她說：「現在社會，是分工合作的，婦女在家庭盡到賢妻良母的責任，亦可說是高尚的職業，功績是不弱於社會工作婦女。」^[28]「無論家庭社會化到什麼程度，人性未改以前，婦女仍舊是家庭裡的柱石、慈愛的中心，而女子的為妻為母，根據男女分工合作的原則，仍舊是她最高貴的任務」。^[29]可以看出，她十分肯定婦女的家庭工作，並將其稱為一種高尚的職業。家庭是國家的基礎，而婦女則是家庭的柱石，因此，婦女改良家庭的任務，實際上就是改良社會的根本。

為什麼女性才是家庭的柱石呢？本文認為有三條進路去思考。首先，劉王立明認同傳統「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說法，並稱其為「男女分責的唯一指南針」。可以看出，在男女分工上，劉王立明較為保守和傳統，將家庭責任完全地放在女性身上，認為為妻為母是女子的永生大道。而現代社會證明，男子也可以很好地完成家庭工作。因此，可以說在這一點上，劉王立明有其局限性，這可能也與其基督教背景有關，即為第二條進路。基督教對提高婦女地位有一定貢獻，但是由於父權制對基督教經典的形成產生影響，在教會傳統和教義經典中都否認了女性與男性完全的相等，使女性居於男性的從屬地位。如「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林前11:3）「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林前11:8）「女人乃是為男人造的」（林前11:9），此處強調了一種等級次序的關係，即從神、男人到女人的排序，將女人放置在男人之下，並成為了從屬於男人的附屬品。基督教還將女性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如：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中一樣，因為不准她們說話。她們總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林前14:34）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弗5:22-24）

這種基督教式的家庭觀念必然會對身為基督徒的劉王立明產生一定影響，但是由上文所述，也可看出她對這種家庭觀念的突破。最後，劉王立明從生物學的角度強調了作為女子天生本性的母性。女子在生理上的內分泌作用正是女子母性的來源。因此母性是無法擺脫的。以上三條進路解釋了在劉王立明看來，女子承擔家庭責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作為婦女解放先鋒的劉王立明並非僅止步於此。在職業與家庭之間，她建立了一個過渡的橋樑，即家事專門化。1934年秋，中華婦女節制協會與滬江大學商學院合辦家事科以使女子家事專門化、職業化，其目的有二：增加女子治家能力；促進女子的經濟獨立。劉王立明認為，女子在教育上常常比較片面，未進學校的女子學習在家中學習灑掃、烹飪、教子等為妻為母的基本知識，沒有經過科學的教育。而進了學校的女學生所學的新知識又脫離日常生活的需求。因此，劉王立明主張將科學教育與家事管理相結合，培養出既有知識又能顧家的女性人才，這就是超越傳統賢妻良母的「新賢妻良母」。不僅如此，這種培養方法又為女性未來從事商科、園藝、衛生等相關職業鋪好道路。同時，為了能夠為了更好地解決女性在家庭責任和社會工作之間的矛盾，劉王立明呼籲政府設立專門學校以促進發展托兒事業。可以說，家事教育與托兒事業是相輔相成的。女性在家事教育上越成功，就越能快速發展托兒事業的建設。一方面完成自身的內化成長，另一方面則能為更多女性分擔育兒的重任，開拓女性的社會化道路，也能在對兒童的教育中，改良民族，強盛國家。

2. 婚姻觀

如何造就快樂家庭，劉王立明認為，首先是要創造美滿的婚姻。劉王立明幼年時就立志改良中國腐敗的家庭制度。到美國留學後她觀察到，國富強的原因一大部分是家庭生活的高尚，不但夫妻恩愛和好，而且子女們都能有自立的精神。^[30]劉王

立明抨擊多妻、納妾，提倡組織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並且主張以戀愛為中心的新型婚姻。

劉王立明倡導永久婚姻。在基督徒看來，婚姻是上帝設立的，具有神聖性，是一生之久的盟約，其本質是奉獻與責任。從基督與教會這個崇高的屬靈關係上來說，婚姻更被賦予了深重無比的意義。聖經強調夫妻之間要相互敬愛與聯合：「然而，你們個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弗5:32）「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了」（可10:8）。劉王立明也提到：「一對夫妻如果要做永久的戀人，他們就必得把義務和權利同等地看重，夫婦在戀愛當中，彼此應當沒有自我的觀念，宣互相愛護，互相犧牲，互相慰藉，互相勉勵，互相諒解，想人生的前途努力，共謀國家、社會和家庭的幸福」。^[11]劉王立明也曾討論過離婚問題，她認為在法律上對離婚的明確規定女權主義的發展的一個標誌。但是她並不支持離婚，她說「離婚不但有時毀滅了私人方面的幸福，同時拋棄了對於家庭應盡的義務。……離婚，無論對於當事人是否有利益，其使社會不安卻是事實。」^[12]

另外，為了以強種、家庭快樂為目的，劉王立明提倡節制生育。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的節育運動者桑格夫人來華，引發一場有關節制生育的熱烈討論。^[13]劉王立明批判地認同節育的觀點。她認為節育可以帶來三個好處：第一就是母性健康；第二就是生產優秀的兒童；第三就是可以使家庭的負擔減輕及國家民族的改良。同時，她也強調不可將節育實行太過，不然就有滅絕人種、增加社會罪惡和反對自然、妨礙健康的危險。

四、總結

劉王立明年幼時受教於基督教教會學校，留美歸國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運動。她是近代兼長理論與實務經驗，將基督教社會慈善、社會服務的精神和實踐方法與中國本土需要相結合的婦女運動人才，也可以說是作為「主體」在中國女精英自我覺醒的標誌人物之一。她所領導的基督教節制會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鋒，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貢獻了巨大的推動力量。她主張家

庭是社會的基石，認為女性首先應該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先成為賢妻良母，之後再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幸福的家庭是建立在愛情婚姻的基礎上的，主張愛情婚姻的自由，主張在追求真、善、美的愛情基礎上的婚姻。但是，她所倡導的「新賢妻良母」、女子參政等都突破了基督教女傳教士單純的「基督教式的家庭主婦角色」，強調女子的自主自立，幫助女性獲得生存、勞動的能力。抗戰時期積極推動婦女力量的發揮，喚醒女子救國的主動性。在此過程中改造基督教教義，使其更加適應中國實際需要，發揮其社會正向功能。

同時，劉王立明的婦女解放思想也有其時代與階級局限性。首先，婦女解放不只是女性自身的問題，而是社會平權問題，因此，應更多聯合男性的力量。雖然劉王立明曾提倡男子參與到女權運動中來，但並未做出相應的實踐與努力。其次，作為精英階層，劉王立明所提出的家庭治理方法雖然有其科學性和正確性，但是對於當時社會的普通家庭來說卻難以實現，反映出知識女性對現代化的想像，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最後，作為一名基督徒，她雖然積極地以基督教之「愛」的精神照顧家庭，關懷他人，發揚基督教積極促進社會進步、世界和平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保守的一方面的影響。

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婦女運動是一個複雜社會問題，受到社會實際情況的影響。婦女運動成功與否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偽政府統治下，官僚內部腐敗不堪，阻礙目標的實現。並且，當時時局的混亂和缺乏組織、領導，婦女解放始終無法成為主要社會議題。當下，正值和平年代，在劉王立明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應更好地挖掘基督教中積極的思想，結合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繼續追隨前人的步伐推動婦女實現真正的解放，為人類解放的最終目標貢獻力量。

本文是中央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項目（項目號：SZKY2022062）；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宗教中國化與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項目號：21BZJ002）的階段性成果。



- [1]目前對劉王立明女士的研究如《劉王立明一位高舉愛國主義大旗的女性》（嚴莊，1994）、《劉王立明與民國時期中國婦女節制運動》（李淨昉，2008）、《劉王立明：中國婦女及人權事業的先驅》（詹婉平，2010）、《劉王立明：百折不擾愈挫愈勇》（曹鴻騫，2012）、《劉王立明與民國時期中國婦女節制運動》（史林，2008）、《投身婦女解放運動事業的先驅——記愛國基督徒劉王立明姊妹》（活石，2019）、《婦女運動先驅劉王立明》（郭衍瑩，2022）、等等都對其人生經歷、革命事跡和婦女事業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但都缺乏對基督教之於劉王立明的影響的關注。
- [2]陶飛亞編：《性別與歷史，近代中國婦女與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頁。
- [3][法]杜赫德，鄭德弟，朱靜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第1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44頁。
- [4]林美玫：《婦女與差傳：19世紀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在華差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81頁。
- [5]楊圓夢：〈基督教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女性陋俗文化變革〉，載《西部學刊》2019年（10），第69-72頁。
- [6]李湘敏：〈基督教教育與近代中國婦女社會思想觀念的變遷〉，載《教育評論》，1997年（1），第56-75頁。
- [7]郎揚：〈19世紀基督教新教對中國婦女形象的建構〉，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4卷（6），第120-124頁。
- [8]尹翼婷：〈「他者」眼中的近代中國新女性——以英國聖公會女部傳教士為個案〉，載《宗教學研究》，2022年（1），第222-229頁。
- [9]劉湛恩（1896-1938），劉王立明之夫。湖北陽新人，教育家、愛國志士和社會活動家。曾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教育總幹事，1928年起任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因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遭日偽特務暗殺身亡。
- [10]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瑾，字璇卿。東渡留學後改名瑾，字（或作別號）競雄，自稱「鑑湖女俠」。她蔑視封建禮法、提倡男女平等，是近現代中國婦女解放的先驅。

- [11]參見：思南：《記劉王立明先生》，國訊，港版，1947年4），第11-12頁。
- [12]筆者所查資料中，都寫到劉王立明是就讀於九江儒勵書院。但從劉王立明對其學生時代的回憶中可知，她所就讀的是美以美會開辦的另一所學校——諾立書院。參見：陳琳主編；余文華、余世磊副主編：《劉王立明年譜》（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1頁。
- [13]李淨昉：《劉王立明與民國時期中國婦女節制運動》（《史林》，2005年（5）），第120-127頁。
- [14]劉王立明：《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協會簡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太湖縣委員會編，太湖文史資料）（第十四輯）；《劉王立明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第1頁。
- [15]劉王立明：《四十年來中國婦女節制運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太湖縣委員會編，太湖文史資料）（第十四輯）；《劉王立明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第364頁。
- [16]石美玉：（1873-1954年），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師之一，也是密歇根大學最早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亞洲女性。創辦了我國早期護士學校之一的但福德護士學校，培養出一大批護理人才，是中國護理專業奠基人之一。與伍連德、顏福慶等籌建中華醫學會，曾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除行醫之外，石美玉還需廣泛參與教會的各項活動，創辦教會、學校，積極參與社會慈善，是中國近代婦女解放的先鋒。
- [17]此宗旨後來改為「促進家庭幸福、拒絕煙酒賭邪、提倡慈孝貞檢」。
- [18]節制會創辦的報刊主要有1922年1月發行的《節制會季刊》，1926年改為《月刊》；1923年發行《女國民》月刊；1932年發行《女聲》半月刊；1935年一面促進《女聲》自立，一面發行《節制叢刊》。參見：劉王立明：《四十年來中國婦女節制運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太湖縣委員會編，太湖文史資料）（第十四輯）《劉王立明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
- [19]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最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9頁。
- [20]陳琳主編；余文華、余世磊副主編：《劉王立明年譜》（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0頁。

- [21]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6年），第215頁。
- [22] 王世傑（1891-1981），湖北崇陽人。中國近代傑出的政治家與法律家。民國時期憲法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倡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先鋒人物。主要著作有《比較憲法》、《中國奴婢制度》、《女子參政之研究》等。在王世傑的中國法律改革理論中，他對在中國舊社會地位最底下的奴婢、婦女給予了極大的關心與同情，吸取西方資本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張廢除舊禮教、提倡男女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為推動中國婦女解放貢獻理論力量。
- [23] 佚名：《抗戰時期中國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與民族認同》[DB/O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ExNTczOQ==&mid=205683037&idx=1&sn=2a0662739094d9f32b19931686b-8702b&chksm=124f68292538e13fcb-d5a19f4e488f74bfa578b594e71fb8b807b940936228aa85e6e8211d43&scene=27, 2023-11-11.
- [24] 萬福林：〈背起十字架來共赴國難〉，載《真光雜誌》第38卷第5期，1939年，第5-6頁。
- [25] 〈婦女基督徒當怎樣為國家服務〉，載《真光雜誌》第36卷第11期，1937年，第34-35頁。
- [26] 同注[20]，第140頁。
- [27] 李惠康、朱海、田華：〈論向警予婦女運動之階層分析〉，載《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6），第69-71頁。
- [28] 劉王立明：《我對於婦女職業問題的意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太湖縣委員會編，太湖文史資料）（第十四輯）《劉王立明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第629頁。
- [29] 劉王立明：《中國婦女運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太湖縣委員會編，太湖文史資料）（第十四輯）《劉王立明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第312頁。
- [30] 劉王立明：《快樂家庭·自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太湖縣委員會編，太湖文史資料）（第十四輯）《劉王立明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第82頁。
- [31] 劉王立明：《結婚的義務》（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太湖縣委員會編，太湖文史資料）（第十四輯）《劉王立明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第229頁。

[32] 同注[29]，第306頁。

[33] 同注[13]。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and Sino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ake Liu Wang Liming-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Women's Temperance Association-as an Example

Wang Fan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wave of World Feminism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After the Opium War, with the entry of Christianity, especially female missionaries, it had an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which was based on Confucian traditional norms and ethics. This article will divide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to three periods, female awakening under the advocacy of male missionaries, female awakening under the advocacy of female missionaries, and self awakening under the advocacy of Chinese female elites. This can reflect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of Christianity to the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ase of Ms. Liu Wangliming, the founder and leader of the Chinese Women's Temperament Association and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as an example, and regards Ms. Liu Wangliming's experience and writings as clues. Also, linking Christian faith and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he Modernization and Sino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Liu Wangliming is a women's movement talent who both does well in theo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combines the spirit and practical methods of Christian social charity and social service with the local needs in China. However, her ideology about women's liberation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era and class.

Key Words: Liu Wang Liming, Christianity, women's liberation